

中传社会学书系



吴景超社会思想研究

邹
干
江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传社会学书系



吴景超社会思想研究

邹
干
江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景超社会思想研究/邹千江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 10

(中传社会学书系)

ISBN 978-7-5657-1383-5

I. ①吴… II. ①邹… III. ①吴景超(1901~1968)—社会学—思想史—研究 IV. ①C9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1354 号

吴景超社会思想研究

著 者 邹千江

责任编辑 黄松毅

封面设计 郭琳

责任印制 曹辉

出版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383-5/C·1383 定 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人类社会从来不缺乏思想,缺乏的是在行动中的坚持。任何一种被广泛信奉的思想的出现,都有其相对相反的同时令许多人信服的思想存在着。于是在这些琳琅满目思想“万花筒”的指导下,人们的行为不能始终一贯地指向早已确定的目标和方向,会迟疑,有跳跃,有时延后、甚至停滞,其间充满反复曲折。比如,我们不能总是坚持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方向,会间歇性地怀念乡村“绿色”无污染的生活而批判工业和科学;同样,我们想多生一个,子女双全,而又希望后一代生活压力不太大,生活更加幸福。我们既致力于建设民主、平等、法治的社会,也憧憬和力图恢复古代礼俗、人情、关系的社会等等。这些看似“旧”的观念一次次以“新”的形式冒出来,实际不过又重演了历史而已。而无论哪个方面,无论彼此如何对立,都能各自找出“正当的”理由,这也许是思想家的职责,一位思想家的天敌是另一位思想家,思想是为早已构想好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寻找各自依据的。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位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他在当时比较闻名,但现在全面了解他的人不多。在他的研究中,明确地提出工业化和都市化、人口减少优化的道路,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影响社会和人类生活最致力和最为密切的因素。这些思想他不能算是原创,但他是坚定的主张者和论证者。这意味着,与之相反的,如农村建设、主要发展农业和人口增加,这些都不是目标而只能作为条件,为工业化和都市化服务。这些

观点有人肯定持不同意见,具有争议,真理的存在是多元的,这是真理作为理论的状态,但是真理最终是简明的,因为真理的归宿不在思辨中,而在实践中,依靠实践检验和证明。而实践,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与理论的设想具有多样性所不同的是,只能将主要力量投入到某个单一的方向。重点投入的部分将加快发展,其余的只能次之,正所谓鱼和熊掌难得两全。农业社会已经发展了数千年,工业社会才不过刚起步,与之相比还很稚嫩,在这种情境下,人们的选择不言自明。如果人们能一如既往坚持既定的方向和目标,而不迟疑疑惑,不受其他思想的干扰,社会的发展显然要快速得多。当然在吴景超看来,这仅仅限于经济领域。

经济发展可以激进冒进,指向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而在政治文化上,吴景超是中庸的,甚至是保守的。他不认为西方的政治文化能完全应用于我国,他既不赞成西方的民主,也不赞成文化上的西化,甚至认为西方的罗曼蒂克也是空虚不现实的,婚姻本身不像想象的那样自由。社会的发展需要公平,经济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前提,经济不公平,其他的公平都是空话。为维护公平,要做好社会保障,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发展和巩固社会事业,完全是一种切实的“实用”的理路。从中完全可见,在经济之外的领域,他是相对慎重的,以对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进行调节,从而减轻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阵痛”。试想,如果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是激进的变革,社会将不堪承受,这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和综合观念。一方面是经济的大力提升,一方面是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作为“后援”的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之欲出,事实上,吴景超很早就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和计划经济分开,并最好和自由市场联姻”这一具有总括性和前瞻的话语,可谓神乎。

仅如上述,我们能够发现,就距今七八十年前而言,吴景超的思想确乎超前了。他显然并不适合于他自身所处的年代,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或者正处于由农业转至工业的关口,这一时期要谈市场经济,几同于梦呓。他不同于那些经济保守、政治文化激进的人,而后者基本是那

一时期大多数人的理想和写照。吴景超的思想不止于此,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城市、阶层、家庭、移民等各个方面,基本构成一个学术体系,他在民国各主要报纸杂志上发表了200余篇论文,除了少部分收录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外,多数没有得到完全的整理。吴景超本人留学海外,回国后教书、研究,但有十多年任职于国民政府。他在政府任职期间,获得不少资料,没有间断发表文章,后由于时代原因,没有机会进行学术研究。尽管如此,吴景超的思想在他的论著中已经基本展现无遗,有些领域论述详细,有些领域作了概述,其中体现出许多思想的闪光点,也有未言之处,来不及系统化和深入,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堆里。为此,我们有理由充分发掘、整理和拓展他的思想,以纪念这位近代以来杰出的、应该说是我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同时,我们不应放过他思想的蛛丝马迹,以便续写他的学术,现在正适逢其时,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节制等等,无一不是当前社会建设的主体。目前对他的研究远远不够,而且是低估了,完全有必要和理由对他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故作本书。

此书不但力求展现吴景超及其思想的全貌,而且与他相关联的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有些同样有学术贡献,但不太为人所知,本书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相关介绍。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社会学研究的概貌,发现一些可能未必熟悉的人物及其思想。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传媒大学的资助,感谢院系提供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致谢学校出版社黄松毅老师的辛勤编辑。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生平及所处背景、学术特征 / 1

一、人物生平略历 / 1

二、时代背景 / 7

三、学科背景 / 12

四、主要活动 / 15

五、思想要点和特点 / 22

六、研究现状及本书的研究 / 23

第二章 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 / 31

一、民国农业及组织的研究 / 33

二、“耕者有其田”和农业机械化:农业的前途 / 37

三、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地位:一次与费孝通先生的辩论 / 48

第三章 工业化 / 66

一、民国工业 / 68

二、工业发展的途径 / 73

三、启示:当前我国关于产业重心的选择 / 79

第四章 人口问题与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 95

- 一、第四种国家 / 98
- 二、人口节制 / 99
- 三、其他人口问题 / 104
- 四、评述及小结 / 106

第五章 中国都市社会学研究第一人 / 111

- 一、近代都市化的产生背景 / 114
- 二、都市救济农村 / 117
- 三、评论 / 123
- 四、城市间的关系 / 125
- 五、结语 / 128

第六章 政治思想 / 130

- 一、民主还是“独裁”：近现代学者对我国政治的研究 / 131
- 二、公民教育及对基层组织的监督 / 138
- 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论控制通货膨胀 / 142
- 四、构建发达的舆论 / 148

第七章 文化思想 / 156

- 一、对于“全盘西化”的讨论 / 158
- 二、中华民族的环境适应力和自信力 / 167
- 三、中西文化关系评述 / 169
- 四、关于“知识分子下乡” / 177

第八章 移民和唐人街生活的研究 / 180

一、欧洲与我国移民的基本情况 / 181

二、早期美国华人的奋斗史 / 184

三、唐人街的组织生活 / 189

第九章 婚姻家庭观 / 195

一、男女平等与家务 / 196

二、家庭的功能下降 / 198

三、父亲的阶层地位与子女的阶层地位 / 200

四、婚姻的基础与养育子女 / 202

第十章 社会公平分配、阶级及社会管术述略 / 208

一、经济平等 / 210

二、社会主义可以和计划经济分开 / 214

三、阶级的限度 / 219

四、财政的公平分配与社会管术 / 223

结语:完整地展现和续写吴景超 / 229

一、吴景超的主要学术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 229

二、吴景超学术的底蕴:关于社会学学科特质的探讨 / 234

三、怎样的结构是适合我国的好社会形态:评述与结语 / 237

吴景超论著及参考文献 / 242

第一章

生平及所处背景、学术特征

20世纪30年代,我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社会学家,如孙本文、陈达、吴泽霖、吴景超、潘光旦、吴文藻、陈序经等。他们大都留过洋,回国后用所学的西方社会学知识结合当时的社会,主要是社会中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观点不但在当时有较强的影响力,而且对当代具有启示意义。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他们中的很多位不太熟悉,介绍他们生平著作的文章也不多。基于此,本书对其中一位——吴景超先生做介绍和分析。对于吴景超的研究已有若干,本书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细致全面的研究。

一、人物生平略历

吴景超(1901—1968),名纪谦,字北海,1901年出生于安徽歙县的一个工商业家庭。歙县位于安徽省南部,历史文化悠远,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徽州文化及国粹京剧的发源地,也是徽商的主要发源地,文房四宝之徽墨、歙砚主要产于此。吴景超系歙县岔口村人,父亲吴瀚云晚清贡生,^①岔口因新安江上游支流大源河和小源河在这里汇聚得名。徽州以盛产茶叶出名,徽州茶叶销往国内外,岔口为其聚散地之一,根据吴景超

^① 歙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歙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48页。

的记载,岔口村中早有数家茶号,吴氏家族便经营茶叶收集运送之业,制为洋庄。“谈徽州之物产者,必言茶叶,徽茶之名,几于中外皆知矣,……茶号最多之处,在休宁则推屯溪,在歙则推深渡、岔口等处云”。^① 岔口村具体所在位置为山村,四围多山,村民务农、养禽、植茶树,茶工包括大号、小号、拣工各类别,民风朴野,但村民多有在京、沪、苏、杭外城市和日本经商者。^② 又非普通的纯粹农民可言。因其经商富有盈余,当地人热衷于办教育,尊师重教,旧式私塾和新式学堂都随时风而立,学校设置不少,使当地子弟从小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在文化上可谓徽商精神和耕读传统之家相结合。吴景超出生于这种氛围的地方,其个人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家乡的特点。他很热爱他的家乡,在《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中,他写到:“人无不爱其故乡,凡有血性者皆然也。岔口,余之生长地也,其地山清水秀,风俗淳朴,余自束发以至成童,皆度岁月于是”。^③

吴景超早年受的是国学教育,1914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1916至1923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共7年)。在清华大学期间,吴景超好读书,据室友,后来成为著名散文家的梁实秋(1903—1987)介绍,他“好读史迁,故大家称之为太史公”。他还爱好写作,自1917年起(就读中等科三年级),就参与《清华周刊》的编辑,毕业前一年,担任了周刊总编辑,课余时间多用于编报,被誉为当时“清华校园的文艺领袖”、“与闻一多齐名的文艺干将”。有研究者将他与闻一多、罗隆基同誉为“清华三才子”。^④ 吴景超后来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负责《独立评论》、《清华学报》等一些名报刊的编辑工作,以及办《新路》等,一生都与报刊工作有

① 吴景超:《徽州之洋庄绿茶》,《癸亥级刊》,1919年。

② 吴景超:《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癸亥级刊》,1919年。

③ 吴景超的学术后来集中在经济方面,有可能受到他出生的工商业家庭环境的熏陶。歙县被授予“中国徽墨之都”、“中国歙砚之乡”、“徽剧(徽班)之乡”的荣誉称号,1986年被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古城与云南丽江、山西平遥、四川阆中并称为我国保存完好的四大古城,素有“东南邹鲁”、“徽商故里”、“程朱故里”的称誉。

④ 谢泳:《清华三才子》,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关,这与他学生时代的这段编辑历练应有直接的关系。

1923年吴景超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插班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学习社会学,明尼苏达大学是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所综合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属于最负盛名的大学之列。1925年进入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与后来成为符号互动论倡导者的布鲁默(Herbert G. Blumer)和人类学家的瑞斐德(Robert Redfield)等同学。^①芝加哥大学1890年由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创办,1892年10月1日正式开课,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设立于1893年,以开展城市社会问题研究著称,包括城市的区位、结构、人口、种族、犯罪等方面,主要针对美国城市的移民研究。调查对象有犹太人住宅区、贫民窟、富豪居住区、流浪者、舞女等各色人群,因其影响大,形成了芝加哥学派,其成员包括有名的帕克、伯吉斯、沃思等。这个学派一度支配了美国社会学,美国式的社会学研究工具、问题、方法、干预方案都因这个学派形成,它在美国社会学里扎根生长,成为标志性的美国社会学符号,培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大批优秀学生。^②吴景超为其中之一,1928年,他的博士论文《共生与同化:唐人街》通过答辩,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这期间他显然受到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深刻影响,学术研究注重实地考察兼及定性的经验研究。

1928年吴景超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先后出版了《都市社会学》(1929)、《社会组织》(1929)、《社会的生物基础》(1930)等著作,这些书籍篇幅不算长,是受南京中央大学著名教授孙本文召集,为社会学本科生编写的国民党教育部圈定的教材,共15种,合订为《社会学大纲》,由世界书局出版,吴景超写了其中3种。1931年起吴景超任清华大学教授,193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期间主编《清华学报》、

① 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② 吴景超后来在我国首创都市社会学以及注重工业,与在这一学派的学习分不开,芝加哥大学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基础和方向。

《社会科学》、《独立评论》，与孙本文、许仕廉、吴泽霖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当时全国社会学学会组织——“中国社会学社”。^① 吴景超担任学会7届（共1—8届，中间第7届因抗日战争未举办年会）理事，理事不固定，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吴景超从未落选，理事会再选出常务委员会，吴景超为常务委员会的书记，^②号称吴书记。1936年第5届学社年会上吴景超被推选为理事长，总理该年学会事务，吴景超的学术地位从中可见一斑。他在这个学社的社刊《社会学刊》上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书评，《社会学刊》每季一期，每年一卷，出版程序是由委员会成员先接洽书店，再由理事会决定。^③《社会学刊》共出版6卷20期，载文300余篇，约200万字，登载了当时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论文。

1933年起，吴景超开始为《独立评论》撰稿并参与杂志社员活动。《独立评论》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标榜“自由独立”精神，它的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主要介绍西方民主，讨论政论时事，20世纪30年代影响力较大。《独立评论》1932年5月22日创刊，胡适是其主编，主要编辑人有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陈衡哲等名学者，1937年7月被政府停刊。吴景超短期代理过胡适的编辑工作，《独立评论》对吴景超影响很

① 中国社会学社1930年2月8日在上海成立，前身是“东南社会学会”。从学社成立至1948年止，共举行过9届年会，入会者需交纳会费，学社倡导协调社会学教学研究。1932年9月1日至4日在北平燕京大学召开的第二次年会参会人员有三四十人。学会似乎有南北派别，会议如果在南方举行，北方会员多不能到会；在北方举行，南方会员也多不能到会，或可能由于地理遥远交通不便的原因。因此，1933年8月22日至25日第三次年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别举行，会员可自行选择一处参会，北平年会委员会由陶孟和、吴景超、吴文藻三人组织，上海年会委员会由孙本文、吴泽霖、钱振亚三人负责。参见《书记吴景超致书友函》，《中国社会学社纪事》，第7页。

② 理事再选出常务委员会，如第二次年会委员会成员：陈达为正理事，钱振亚为副理事，吴景超为书记，吴泽霖为会计。

③ 编辑委员会9人，分工如下：论文孙本文、黄凌霜、陶孟和、杨堃、陈达；书评吴泽霖、吴景超；消息许仕廉；杂志论文提要吴文藻；孙本文为常务委员。《社会学刊》第1卷1—4期由东南社会学会编辑，从第2卷第1期起改由中国社会学社编辑，作为全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刊物。该刊出至第5卷第3期时，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1948年1月复刊后仅出了全年合刊的第6卷，此后未再刊行。

大,可以说,《独立评论》“自由独立”发表观点的风格基本是吴景超的学术风格。



1935年底,吴景超随翁文灏赴南京,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转入政界,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①参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工矿调整委员会、行政院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质管理局主任秘书处长,兼任三青团经济处副处长、重庆国际最高委员会参事。1936年7月,为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调查科主任。^②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于战前成立,其任务在于发动一场政府组织的群众性经济建设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发展经济,为抗战做好经济准备。1937年1月16日,受这个委员会的派遣,吴景超参加和指导了湖南分会成立的仪式。^③1937年3月至11月,参加祝英皇加冕观礼团,出访英国,随后赴法国、德国、苏联考察。1938年,在重庆创办《新经济》半月刊,期间担任主要编辑,这一工作至1945年止,他在上面发表了几十篇文章。

① 1936年6月随参事张锐奉行政院令视察鄂湘赣地区,参见《行政院第3331号》,《江西省政府训令》民一字第9915号等。

②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指令》运字第8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会报》第1期。

③ 吴景超作为总会代表参加了湖南分会1937年1月20日的成立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训令》,运字第328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指令》,运字第327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会报》第16期。

1943年至1944年吴景超赴美做宣传研究工作,在各大学、各公共团体多次讲演。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视察了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五省灾情及各区善后救济分署工作,行程5000多公里,调查实录整理成《劫后灾黎》一书。这是一本日记体形式的书,记录了吴景超每天的行程见闻和赈灾、重建及恢复秩序等事项,由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从1935年至1947年,吴景超主要以政府工作为主,期间利用这种行政身份开展了学术调查,获得了不少宝贵的数据资料,文章写作也没有间断。1947年3月,他重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执教。

1948年是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选择期,吴景超与钱昌照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钱昌照是吴景超任职政府时结识的。钱昌照,江苏张家港人,1919年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2年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后长期负责资源委员会的工作。资源委员会原属国防设计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勘探和开发工矿资源,布局工业企业,类似于现在的国资委,隶属于经济部,吴景超是经济部秘书。他们共同发起联合教育界和政府、实业界人士建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成员有58人,其中教育界34人,其他为官员和公司董事、经理。^①同年5月15日,吴景超创办《新路》周刊,负责主要编辑工作,“社经会”为《新路》提供资金支持,《新路》名称意为探索中国的新道路。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走一批知名教授,即所谓的“抢救学人计划”,吴景超拒绝南下或出国,并曾私下劝阻胡适不要走。

新中国成立后吴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撤销社会学专业,他调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1953年至196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教授,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国

^① 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9页。

人民大学区分部委员。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斗，被剥夺了教师资格，辛苦收集的几大箱卡片遗失。1968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1980年9月摘帽平反。^①作为从国民党政府至新中国的一名学者，吴景超带有明显的时代过渡和蜕变的痕迹，并在那个政治挂帅和政治运动的特殊时期，经历了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磨难。他喜欢的学术中断了，这使得他后期的学术贡献甚少，才情有所浪费。他没能看到改革开放，目睹1978年后我国风起云涌的新变化，不能于暮年之际重焕学术风采，诚为可惜。



二、时代背景

吴景超的学术黄金期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主要是30年代。30年代为我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产生了许多众所周知的优秀作品，有的堪称经典，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的最高水平。这种学术发展的盛况与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关。

思想和文化的活跃往往来自国家和社会受到严峻的挑战。近现代以来，西方与我国真正接触，西方是我国遭遇到的最大挑战，这种挑战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的物质、精神和文化传入我国，使我国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西方带来的是一种根本的生存上的危机感。梁启超言：“方今四彝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痛；三千年之宗教，

^① 部分内容参阅了周叔俊：《社会学家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有坠地之惧。存亡续绝,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诚非危言耸听之词。严复亦说,“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名亟也”。可见当时之情形,为现代人所难以想见。社会面临整体转型,许多问题集中爆发,而且每个问题都刻不容缓,借用胡适的话是要“废除几千年来酷的酷刑,一千年以上的小脚,五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帝制。”以吴景超个人体验,1930—1940 年代社会的整个情形是“一方面有内乱,一方面有外侮。内乱的结果,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外侮的结果,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① 这样的一个时代,正是思想和学术发展的契机,因为人们迫切需要解释社会,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应对危机,各种思想和学术就必然应时而生。

西方与我国接触,展现出现代工业社会的画卷,和人们以前经历的农业社会有质的区别,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社会。当时的人们普遍发觉到这些差异,一些先知先觉者倾向于发展工业和城市。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党政府主持和管理国民生活,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经济建设获得了短时期的喘息之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现代化有了一定的进展,号称“黄金十年”,包括电子、煤炭、钢铁在内的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② 供职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中国经济研究小组的叶孔嘉博士对 1936 年和 1911 年的经济进行比较后认为:“总产出有了明显可辨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资源从生产力低的部门显著地流向生产力高的部门,近代技术在制造业与运输业的推广,以及城市化水平也在日益提高。显然,经济近代化已经开始,尽管速度缓慢,并仅限于少数几个部门和地区。”^③ 这个结论说明当时工业和经济取得了相对质的发展。

①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17 页。

② 工业增长率 1931—1936 年为 6.7%,发电量 10 年增加了 1 倍。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4 页。

③ 托马斯·罗斯基著,唐巧天等译,《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 页。